

中经要报

国家信息中心

增刊 2017 第 7 期 (总 1104)

2017 年 11 月 27 日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3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框架和内涵.....	3
构建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8
现代金融纳入到产业体系.....	11
发展协同的人力资源.....	13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15
区域协调发展将呈新局面.....	16
乡村振兴战略造就“三农”新面貌.....	17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
经济改革重点是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配置.....	22
完善产权制度.....	23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25
宏观调控要有度.....	26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29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32
金融开放迈入新时代.....	34

编者按：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自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后，又一次提出重大的制度体系建设目标。报告赋予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内涵，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经济基础。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总纲领，本刊着重从十九大的新提法去探寻今后经济领域发展的新动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认为，这清楚地表明了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过这三大关口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着力解决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而非以往的规模问题速度问题。新的发展理念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主线，而非速度和规模。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框架和内涵

十九大报告赋予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内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及研究员王小广：现代化经济体系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动力体系，就是发展要有新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视新旧动能的转换，推动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由新旧动能的转换、创新驱动动力的形成建立现代动力体系。二是产业体系，就是要有产业支撑。三是经济体制，就是要有体制支撑。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指由“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协调体系、开放体系、体制机制”等五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产业向全球中高端价值链迈进，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要超过 70%；第二，建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70%；第三，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 1/3 左右；第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超过一半，基尼系数控制在 0.4 以下，人均 GDP 在 2050 年达到 4 万美元左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华大公共治理学院助理教授张新：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效益的经济水平；中高速的经济增速；高水平的农村发展；更平衡的地区发展格局；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全面的对外开放。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是实体经济的现代化，其次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创新体系，再次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最后是促进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变成重消费、稳出口、低投入、低污染、高效率、高质量、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增长。首先，低投资就是要提高投资效率，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投资规模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重要方向就是要更多投向民营企业；其次，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更加注重绿色的经济增长；第三，实现包容性增长，使得发展红利为全民所共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有四点：一是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要在一批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上占领技术制高点，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进程中争取弯道超车，缩小同领先国家的差距，培育全球主导权。二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和激励企业不断

升级，追求卓越，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企业能够根据社会需求升级的要求，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不断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的供给。四是绿色低碳和节约高效。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转向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必须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至少具备几个特点：现代装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绿色发展；经济增长质量更高；市场化程度提高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和稳定开放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十九大报告对怎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系统论述，重点是推动三大变革。提出三大变革是有针对性的，是问题导向的。第一，质量变革。中国近40年的发展，速度很快，规模已经相当大，但是经济发展质量还不是很高。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很多细节上质量上不去，特别是一些制造业环节。第二，效率变革。当前我国还有不少低效率的地方，行政性垄断、经济泡沫、金融风险等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效率不高的问题。第三，动力变革。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劳动力总数已经在减少，工资水平在上升。下一步要把过去劳动力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质量第一”是全面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是当前阶段首要的工作重点和改革方向，而“效益优先”是全面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指向，是当前经济发展成果的检验手段和具体导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从基本特征看，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效率的发展水平、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平衡发展的地区格局、高水平的农村发展、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等七个新特征。

构建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金融脱实向虚、人才结构失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重挤压”，即中高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美国特朗普政府拟通过减税和提高进口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的压力），中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分流，还有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向虚拟经济倒流，导致实体经济发展遭遇资金、缺人才、科技“三缺”，陷入成本高企、结构失衡、转型困难等困境。在科技创新方面，主要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资源分配不合理、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足、科技与实体经济两张皮现象依然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如2016年我国专利授权175万件，实施率只有10%。在金融方面，存在金融供给约束和资金配置扭曲，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或在金融系统内空转，产能过剩行业和国有企业占有大量资金，新兴产业和中小微型企业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得不到金融供给的有效支持。在人力资源方面，主要问题是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科研人员大而不强、缺乏世界级科技大师和“高精尖”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脱节等，如有分析表明，2015年清华北大毕业生约30%在金融领域就业，说明高端人才大量流向金融行业，进入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实体经济部门少。可见，目前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还没有形成有效组合、向实体经济聚力发力的协调发展格局。

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这是第一次提出建立一个四个方面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产业是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内核，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头戏。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一个新提法。“新”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两年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现象加

剧，强调把经济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突出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二是把现代金融从服务业中突显出来，纳入产业体系的一部分，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三是强调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三大要素有效组合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四句话的逻辑关系是：实体经济是根基，科技创新是筋骨，现代金融是血液，人力资源是神经中枢和细胞，只有把科技、人才、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组合起来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河南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富禄：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支撑不足。例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技术创新支撑薄弱，支撑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亟待加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占据明显领先优势。受多种因素影响，现代金融业发展也存在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悖离规律、难以持续的问题，信贷供求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脱实就虚问题更为突出，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而是转向虚拟经济，例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等。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还有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等部门。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有待大幅度增强。产业转型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度异常迫切，但是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不足，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乏，尤其是人才的积极性发挥存在障碍，整体创新效能不高。长期以来高校考核体系追求的是高水平论文、高水平成果、发明专利，企业的追求是有市场、有竞争力的新工艺和利润效益，科技和产业两张皮现象突出，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仍需进一步培育和优化，创新型企业等群体亟需发展壮大、释放活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技术、资金、劳动力，是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要素。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实现实体经济与三大要素协同发展，将推动实体经济沿着高质量轨道成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必须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杆，持续提高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质量层次和品牌影响力，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形成高质量供给体系。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推动存量资产重组，为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做好中长期资金供给的制度安排。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

近几年，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2016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2%，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更加凸显。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科睿唯安公司联合向全球发布《2017研究前沿》报告和《2017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报告分析显示，中国在25个研究前沿表现卓越。其中，在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数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领域得分排名第一，表现最为活跃。在总体表现上也仅次美国。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至2017年10月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35万次，较2016年统计时增加29.9%，超越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提前实现《“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的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到世界第二的目标。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白皮书暨中国生物工业投资分析报告2017》认为，我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格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生产技术水平大幅提高，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上下游联动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白皮书指出，2014—2016年，中国申请人申请的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占全球总量的30%左右，名列第一。但2014—2016年，中国申请人在国外申请工业生物技术发明专利仅占此期间中国申请人申请的

发明专利总量的近 5%。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的创新经济发展很快，但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要完成任务，就必须牢牢把握全球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新机遇。

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强调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倡导创新文化等，特别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在业内普遍看来，要推动产学研融合，关键在于破解产业和学、研“两张皮”的问题。过去企业委托高校，一纸合同委托项目，而高校追求的是高水平论文、高水平成果、发明专利；企业的追求是有市场、低成本、高工艺。这两个追求、这两个目标没有同步到一个点上。

2016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与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形成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

2017年9月，《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正式发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技术转移体系的概念，并提出“两步走”建设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第二步，到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建成。10月，科技部又印发《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指引》提出，示范区建设期原则上为3年至5年，“十三五”期间部署建设十个左右。打造形成一批政策先行、机制创新、市场活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高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在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转化应用体系方面，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将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设立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或中试熟化基地等，共同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与推广、标准研究与制定等，完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扩散的机制。二是探索创新挑战赛等“研发众

包”新模式，鼓励企业面向社会开展技术难题竞标，引导科技人员、高校、科研院所承接企业的项目委托和难题招标，聚众智实现开放式创新。三是支持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开展以技术应用为导向的协同创新与集成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或新动能，而创新是新动能或新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人才创新、信息创新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一定是持续全面创新的结果。

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王得新：科技创新是现代产业体系重要的战略支撑和核心途径。产业迈向中高端根本上还是需要科技上的突破和创新，形成“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的国家创新体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倡导创新文化、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发挥先导性作用，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最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新技术将重构产业格局和生产方式，当中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绝不能错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窗口期。如何解决创新面临的动力、能力问题建议：一是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新产品、新业态、新技术标准，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破除制约企业创新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束缚。二是优化税收结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进减税降费，使实体经济的利润与社会平均利润率趋同，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入。三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推广科研成果股权、期权激励政策，提高劳动报酬，促使优秀人才向创新领域集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要优化创新环境，不仅促进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创新投入，更要提高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还要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培育更多创新型人才，塑造我国人力资源新优势。

中科院院士王曦：应用基础研究是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科研界

有个说法是“顶天立地”，基础研究是顶天，成果转化是立地。应用基础研究在这两者之间，主要做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和共享，是双创的基础和技术源头。应用基础研究要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结合起来，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建设科技强国的结果。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及研究员王小广：创新、科技进步是衡量世界各国先进程度、现代化程度的标准。而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之外的一个要素就是科技进步，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简单地说，一个国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要超过 60%-80%时，才可以说，建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因此，现代动力体系的形成，最终是要让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现代金融纳入到产业体系

十九大报告将“现代金融”纳入成为我国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定位已经非常明确。在这样的定位之下，新时代的金融工作路径日益清晰：现代金融需要以现代的方式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中代表新时代发展方向的事物；现代金融需要现代的调控方式和监管方式，积极适应行业新形势；现代金融需要将金融安全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经过今年以来的整治，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未来银行业要继续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工作，重点支持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三农融资、脱贫攻坚方面的融资。

中国的企业融资目前仍然过度依赖商业银行。2016年我国社会融资存量为167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67.9%，达113万亿元，企业债券占比10.59%，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3.74%。而在银行体系中，资金天然会流向有硬资产抵押、政府隐性担保的传统国有企业。拓宽金融供给渠道，打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条动脉”，

解除金融供给量的抑制，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指出，未来几年要在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同时补短板，其中包括补齐资本市场的短板。要持续推进改革，以更大的勇气推进开放，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将现代金融明确归入产业体系，强化了这样一个定位——金融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共生共荣，并非分割的孤岛，金融要回归本源，服务好实体经济，而不能搞自我循环、自我膨胀。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实际上现代金融本身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现代经济也很难把实体经济和金融截然分开。金融通过服务实体经济获得自身发展，而实体经济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服务

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把现代金融归入产业体系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强调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支撑，而不是孤立的、分割的。这个定位就要求金融业发展回归本源，服务好实体经济，而不能搞自我循环、自我膨胀。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金融业应该主动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金融解决方案，从以往注重传统行业转向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从以往主要为生产者服务转向更多地为消费者服务，从以往集中于东部、集中于大城市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乡村延伸，从以往动员储蓄、推动大规模投资的粗放式金融发展模式转向利用金融科技、高效配置金融资源的集约型金融发展模式。银行应该突出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本质特征——流动性创造者，在稳定存款来源、优化贷款结构的基础上，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流动性解决方案。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未来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是回归本源、强化监管，而实体经济也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改革和调控，需要加强协同配合。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为了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银行应从消费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四个方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农业银行：要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对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加快前瞻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服务方案。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对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和补短板领域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有所作为，切实做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服务。要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大对“双创”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金融支持，把业务重点切换到新经济上来，加快形成金融服务新经济的有效模式。要始终高举服务“三农”大旗，认真研究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任务。

发展协同的人力资源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格局调整、教育培训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叠加，我国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错配，主要表现为：一是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而相应的教育培养结构滞后于经济社会需求的实际变化，部分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和紧缺专业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二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 1/5，高技能人才数量不足 6%；同时，近年来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 1.5:1 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 2:1 以上。三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

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今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坚持人才引领创新发展，将人才发展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综合运用区域、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杠杆，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

十九大报告将人力资源置于与产业体系之中，突出了人才对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报告提出，“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积极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人社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副司长张文森表示，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围绕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的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和优化人才配置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67万家，从业人员55.3万人，行业全年营业收入1.18万亿元。10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规模达到2万亿元，行业从业人员达到60万，基本建立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保障、经营性服务逐步壮大，服务就业创业与人力资源开发配置能力显著提高，人力资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及研究员王小广：十九大报告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六项工作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这意味着就业水平、就业质量、人才水平在明显提高。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劳动力总数已经在减少，工资水平在上升。下一步要把过去劳动力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现在，我国每年有7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如果把劳动者大军都变成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人才，对经济增长实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对创新驱动，都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改革开放处处长张焕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给端看，核心是人才，要依靠人才的投入来提高产出，要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研发体系，要有若干有国际美誉度的中国品牌，要集聚一大批国内外高端人才。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率先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

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联合委员会副秘书长崔秋立：今后，需加快形成创新型、开放性、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实现工学一体、产训结合。同时，还要将职业资格标准融入人才培养，盯住企业需求及产业发展，培养一批符合标准且有较好的职业发展能力的技能人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十九大报告已提出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第一，加大力度改革完善教育培训体系，一是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步伐，使得新增劳动力至少具备高中阶段的文化素质水平；二是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继续大规模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三是改革教育结构，更多地面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设置专业和课程，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体系；四是健全职业培训机构，使之更加灵活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其变化。第二，要重新建立健全用人单位尤其是企业单位的培训体系。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区域经济专家范恒山指出，虽然东中西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格局的扭转，使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区域实质性差距还未明显缩小。比如 2006 年，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 6.7 倍，2016 年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天津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 4.3 倍，差距依然明显。同时，区域发展分化现象逐渐显现。从“四大板块”之间来看，2013 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与其他三个板块的分化愈加明显。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虽快于东部地区，但增速差距也在持续缩小。从板块内部来看，经济增长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特

征比较明显。少数地区甚至出现要素支撑“入不敷出”状态，吸引外部资源要素有限，而流出加速，出现人口净流出、民间投资下降较快等现象。

着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化解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难题。

区域协调发展将呈新局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现代化区域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现代化的区域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建设一批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城市和乡村。建设现代化区域体系还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十九大报告在经济建设部分专门论述了区域方面的两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及研究员王小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的大结构还是按照十八大或者是更早一些说法。但过去把城镇化单列出来或者把城镇化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重点，而十九大则是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区域问题纳入这个部分。第一，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这次在十九大报告中更加系统化。在表述上也有新变化，过去是讲“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四大板块”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现在在顺序上作出了调整——老少边穷、西部、东北、中部、东部，重心更偏向于老少边穷、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的顺序靠后，因为它们发展相对比较好一些。第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去这个部分也是放在城镇化部分，现在放在区域发展部分，因为城市也是一个区域问题。第三，三大区域发展的重点，即：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过去，区域发展“三大战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跨国倡议，所以十九大在国内区域发展补充了“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这使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地位又一次变得比较突出。三大区域的发展重点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翁钰珍：区域协调发展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构建新的城镇格局，这其中农民工转移很关键。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中国梦”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实现城市梦。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这个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这是在较长时间跨度中对中国经济发展空间进行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将不断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活力，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发动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照，十九大报告区域政策替代了价格政策。这是因为这几年价格改革进展较快，截至2016年底，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剩下3%不到政府定价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因此已很难运用价格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而中国那么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优化重大结构的内涵，而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正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

乡村振兴战略造就“三农”新面貌

我国城乡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一方面，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差距较大；另一方面，优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与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就是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十六届五中全会，曾经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做出了一个概括，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而此次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新要求，比之前的要求更高。这个战略的实施，将会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这是中央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36%左右，至2016年末已攀升到57.4%，但随之而来的乡村衰落已不容忽视。在一些地区，即使乡村的人口在缓慢增长，但活力越来越小。每年都有上亿农村人口，其中大多数是青壮年，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事实上，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均应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此相互支撑。中央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11月20日中央深改小组会议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关于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请示》。会议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关于农村宅基地，会议强调，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已经有了前期的实践基础，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不得以买卖宅基地为出发点，不得以退出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抓住了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短板。乡村的振兴不仅仅是“三农”发展问题，更涉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央视新闻：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工作重点。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一系列战略中，增加了乡村振兴战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城乡结构变革将释放农村大市场的潜能。未来 5-10 年，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将形成近百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成为中长期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均应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此相互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极大提高了农村发展的标准，有利于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预计未来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乡村衰落、农村凋敝会有新的针对性政策。报告也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毅：
“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发展理念既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也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明确了乡村发展新思路，是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转变。当前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乡村还是发展中的最大短板，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消失，一些乡村片面追求所谓现代化城市生活，建造了外表上与城市无差异的社区，乡村发展又失去了原有的乡土气息和文化。新世纪以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从 2003 年开始连续 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十七大和十八大也分别提出了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对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发展动力来看，政策重点侧重于城市，使用的政策手段是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反哺和扶持，把农村放在了城市的从属地位，使其被动地去接收城市发展的带动和辐射，没有从内在上激发乡村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把乡村放在了与城市平等的地位上，把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更加充分地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更加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改变过去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为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乡村要成为与城市并行的发展主体，要站在乡村发展角度去设计政策，充分激发乡村活力。城乡融合也是在保持乡村独立性和差异化前提下的融合发展，以差异化发展路径来突出乡村的比较优势，由此推动城乡关系改革势在必行。一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一方面乡村还会继续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打破阻碍农村吸纳城市资源要素的栅栏。二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逐步消除城乡间基础设施差异，不是把城市的高楼大厦等表象向农村延伸，而是在保持乡村文化和风情的基础上，推动乡村生活品质和质量提升。三是特色小镇为载体，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四是借助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盘活乡村闲置建设用地。对村庄整治节约的建设用地指标，允许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用于农村产业发展，土地指标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之外人员在农村使用。简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餐饮、住宿等乡村休闲服务业发展和休闲娱乐设施建设的审批程序。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这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产业兴旺是要跳出单一的农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钱可赚的产业，由此带动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让乡村成为人民向往的美丽家园，实现新时代乡村现代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抓住三个字——人、地、钱。从“人”来看，就是要在继续推动农业人口转移进城、降低乡村人口占比的同时，注重解决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引导部分农民工返乡，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在城市长大的科技人员下乡，到农村去创业。高起点发展现代农业、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从“地”来看，就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三权分置制度。对农用地而言，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已经明确再延长30年，这同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点相契合的。既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又给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再研究新的土地政策留出空间。对宅基地经营性和公益性的集体建设用地而言，要从长远考虑，根据未来乡村振兴的需要，逐步盘活，用出效益来。而“钱”，就是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使之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求相适应。就是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要贯穿于乡村规划制订的过程中，贯穿于有关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把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加强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乡村的振兴。

河南省邓州市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这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要在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农户经营权流转的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科技、资本、人才进入农业。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振兴。

上海市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此外，我国1998年开始新一轮土地承包，期限是到2028年。十九大报告定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十九大结束不久的10月3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审。《草案》规定，为了给予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预期，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土地延包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同时促进农村土地市场有序流转，给农业投资者进一步吃定心丸。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此前对第二轮土地承包2028到期后怎么办不明确，有些农业企业不敢轻易加大对投资，现在应该没有

担忧了。

中信研究：承包期的延长有望提高土地的利用度，坚定土地投资信心。同时，土地承包期的延长有望稳定承包农户与流转主体的土地流转关系、提高土地经营权贷款额度，使得土地流转加速、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土地经营效率激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近 40 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投融资、价格、国企国资、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快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虽然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能适应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更不能满足未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着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胜法宝。按照十九大部署，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不断改进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全面落实产权保护制度，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经济改革重点是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配置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王得新：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勾勒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继而提出五大体制改革。经过党的十五大、到 20 世纪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完善的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此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十九大报告继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指出改革的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针对性和指向性更强。

完善产权制度

完善产权制度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穆虹指出,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其核心是产权保护。因此,完善产权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要着力加强产权保护。在创新日益成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今天,要加快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探索对科研人员实施股权、期权和分红激励,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长期激励作用。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例如,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这毫无疑问坚定了市场化改革方向,也是实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体制保障。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副司长万劲松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发挥产权有效激励作用,重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多种产权情况下产权界定和配置。现代产权概念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知识产权、人力资本产权等各种无形产权,还有很多共有的产权等。二是产权内部多种权利关系的界定。比如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管理链条长、环节多,容易产生主体虚置的问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集体所有权有可能出现空置和虚置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体制改革部分第一条写的就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流传千百年的话第一次被写进中央文件。十九大报告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继承和发展。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产权制度不只是产权保护制度，还包括产权界定、产权确权、产权流转等制度。所以完善产权制度的内涵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广泛，有待完善的任务较多。2017年3月，全国人大已正式通过了《物权法》，这是有关产权制度的最重要法律依据。未来有关产权保护要走法制化的道路，不能过多依赖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而应主要依靠严格执行《物权法》。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国研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马名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内外创新型企业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是切实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提升知识产权对创新收益的价值。因此，要更加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依赖于“以完善产权制度和优化要素市场配置为重点”的一系列经济机制体制改革，依靠激发全社会最广泛的创新创业动力，来激励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没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企业家就缺乏充分激励提供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要素自然流动，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也会影响人民以合理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王得新：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增加国有产权的流动性，明晰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护私有产权，加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激发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

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在国有自然资源产权上，应形成“一级所有权，两级产权”的中央地方产权结构，以此替代“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传统体制。一方面，通过构建两级产权上收地方基层政府实际拥有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产权监管体制，把产权监管与行政监管分开，由不同的机构来承担。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穆虹提出，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依法保障平等就业。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完善劳动就业法律制度为抓手，打破城乡、地域、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积极顺应新产业和新用工形式的变化，使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在土地市场改革上，应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严格用途管制和用地规划管理，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权能，实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深化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占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重已不到3%。同时，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科学定价制度初步建立，价格杠杆作用进一步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推行，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持续加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发改委近日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未来三年价格机制改革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到2020年，中国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低收入群体价格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体系更加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价格环境基本形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建议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可以率先在核心区周边小城镇建设中推进此项改革，配套推进农村社保制度改革，给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民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要素市场化配置，实际上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另一种说法，因为资源配置就是要素配置，

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或资金配置。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干预要素配置的事情比较多，市场化配置还不够，未来要改变这种要素配置格局。

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王得新：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体系建设，我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十分完善，但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了资源在产业、区域之间的有效配置，是制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制约因素，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增加要素的流动性、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宏观调控要有度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三个有”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要有效、微观主体要有活力、宏观调控要有度。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宏观调控有度是新提法，是前两者的重要条件，要求政府宏观调控既不越位，也不要缺位。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及研究员王小广：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16经济工作重点围绕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十九大报告对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提出宏观调控有度，这是一个新的说法。

财政方面，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权责清晰包括两层内容：一是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细化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政权限、司法权限、立法权限等，基于此，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事权；二是根据事权划分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格局，科学核定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及其实现方式。财力协调包括两层内容：一是中央和地方各自本级收入与所承担的支出责任相协调；二是实现中央和地方掌握的总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协调。区域均衡则指，收入划分要把省际间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省际间分布合理，以及各省对下的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相对平衡。

中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这就要求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上重新厘定权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李鲁云：现代财政体制需要以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地区差距的标准，使不同区域实现财力均衡，从而更好地支撑当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实现规范化和现代化，才能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些年来，财政在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做了很多事，成果是显著的，但仍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加快建立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绩效预算制度。

货币政策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十九大期间表示，中国较早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在中国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扩张速度要与经济发展、资本金相适应；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MPA，使得跨境资本流动趋于稳定。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形成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宏观审慎就是对金融顺周期行为和跨市场风险传染对症下药。建立“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保持币值稳定，二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央行在《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开辟了专栏来详解“双支柱”调控框架。报告称，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能够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都可以进行逆周期调节，都具有宏观管理的

属性。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侧重于物价水平的稳定，以及经济和就业增长；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能够“对症下药”，侧重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者恰好可以相互补充和强化。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体系：继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价格型调控和传导，继续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挥金融价格杠杆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架构，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重要目标之一，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也与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的大方向一致。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既能发挥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稳定经济运行，稳定物价，平抑实体经济波动，又可以通过宏观审慎管理让金融在合理范围内发展，确保金融发展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这个框架的特点就是在传统的货币政策以外，把金融稳定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MPA体系有7个指标包含16个子指标，基本上涉及到银行运行的各个方面，算是比较完整、细致的框架。从目前来看，我国宏观审慎体系刚刚起步，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指标的合理性和实施的力度和范围，还有优化的空间，应根据实际的运行情况 and 政策调控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姜超：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日渐清晰。央行采取价格型货币政策，通过构建利率走廊，将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限定在利率走廊之内，并以DR007作为基准利率引导，这样就能基本锁定银行资金端的利率水平。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补充，通过MPA监管，对银行本身的杠杆率、信贷扩张、和流动性等方面进行约束，从而压缩同业规模，减少银行对非银等的资金融出，达到逆向拆解非银和影子银行杠杆的作用。而未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

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市场利率的期限结构，疏通利率的传导路径；另一方面，完善MPA考核框架，逐步把同业存单和更多的金融创新活动纳入考核范围；最后，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联动和协调，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完善调控机制。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2017年7月14-15日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按照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所谓宏观审慎框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纳入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使得跨境资本流动趋于稳定。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形成以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提法，也是未来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2016年央行推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弥补了以往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并引入逆周期调控因子，目的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双支柱框架是我国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实践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宏观审慎政策为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提供了有力支持，“双支柱”互相协调增强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较好地维护了金融稳定。建议，下一步还需要对相关机制继续加强和完善：首先，要持续加强货币政策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再次，要进一步丰富“双支柱”框架的内涵和外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并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贸易、区域开放布局、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等方面对推动

开放新格局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着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引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今后，除极少数敏感领域外，其他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开放，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限制也要逐步放宽。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就是要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11月初，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宣布，扩大金融开放，并逐步适当降低汽车关税。在2018年6月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对于玉米酒糟在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实施相同的增值税政策，恢复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中国要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更大努力。国务院今年两次就利用外资问题出台了专门的文件，这充分表明中国政府重视改善利用外资环境的决心。下一步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此外，汪洋指出，内陆和沿边地区开放虽取得长足发展，但总体上还是对外开放的洼地。西部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7.6%和7.7%。内陆和沿边地区劳动力充裕，自然资源富集，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步从开放末梢走向开放前沿，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广阔。

要按照报告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部署，在深化沿海开放的同时，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为开放的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提升，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特殊意义。从十九大报告看，开放新格局包含了新模式、新平台、新业态、新领域、新优势等深刻内涵，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也需要在这些方面发力。在新模式方面，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与经济发展新形势相适应的开放和合作模式；在新平台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将获得更大改革自主权，将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加快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新业态方面，运用新的信息技术发展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在新领域方面，扩大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在新优势方面，主要是提升开放水平，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体系。开放也是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开放可带来新市场，推动现代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开放可以促进改革，推动现代产业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全面开放体系的支撑。全面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合作等。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副研究员杨长湧：十九大报告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这不仅明确了我国外贸发展的目标，也指明了具体实现路径。总体上看，我国外贸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为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要看到，我国与贸易强国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对此，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优化外贸布局，加快外贸新优势培育，推动外贸多元平衡可持续发展。

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里奥斯·马拉泰蒂斯：“一带一路”倡议被确定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这一倡议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很多机构和国家将此视为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关键来源之一。中国市场的包容开放不仅有利于海外投资者，也将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贸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当前，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以新加坡为例，其通过电子系统处理贸易报关，99%可以在10分钟内处理完毕，每年节省的贸易成本高达上十亿美元。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上海、浙江、辽宁、福建、广东等多地启动研究申报自由贸易港，不少地方已是自贸试验区，依照打造自贸试验区升级版的思路研究探索。业内专家分析指出，自贸试验区在率先探索自贸港建设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首批自贸港或来自自贸区升级版。

2013年9月，我国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即上海自贸试验区。此后，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到11个自贸试验区，包括天津、广东、福建自贸试验区等。在这些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往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具有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今年3月底，国务院批复辽宁、浙江、河南、湖北等7个自贸区成立，使自贸区阵容增加至11个，实现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引领开放新格局。

10月26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称，商务部正会同上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浙江则制定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省市和部门，加大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今年3月31日，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

就已经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自由贸易港属于自由贸易区的一种，一般处于港口等交通物流枢纽，在功能上，更加方便外国船只自由出入，如外国货物的进出、装卸、分选加工、重新包装、储存与过境中转，以及专门进口原材料进行外贸加工再出口等，也可享有免征全部或大部关税等优惠待遇。在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将会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开放层次更高、力度更大，形成更高层次的资源优化配置，也有助于对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自由贸易港建设尚在探索阶段，未来推进应循序渐进，可先从沿海、沿江港口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再向内陆地区的空港和无水港推进。

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当前，自贸区的部分阶段性改革目标已经实现。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迫切、国际经济形势快速变化，自贸区改革需要加速，有必要赋予更大自主权，激发改革活力。自贸港是自贸区的进一步延伸与提升。自贸港在现有自贸区对标国际先进开放水平的基础上，看齐国际最高开放标准。比如探索人才、物资等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金融与国际市场的充分融通。探索建设自贸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工程，要从八个重要方面着手，才能构建起自由贸易港的主体框架。按照世界上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经验，这八个方面包括港区一体化、组织架构、监管制度、税收体系、市场准入、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与腹地经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自由贸易核心在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在目前阶段，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但发展本地贸易、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离岸贸易、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

金融开放迈入新时代

十九大后，金融业开放引人关注。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宣布，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中心组学习会议时强调，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提升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加速，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新货币篮子，亦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时刻。

今年7月份，央行在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表示，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其中包括放宽QFII和RQFII市场准入，扩大投资范围，有序扩大与香港互联互通投资标的，稳步推进沪伦通，吸引境外机构投资者多渠道参与资本市场。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林钰华：此次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将继续推进中国建设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中国金融业加速开放，将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及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力军，金融服务业将进入一个开放引领的新时代。改革除了为金融消费者提高服务水准外，从宏观角度看，更重要的是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让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进一步改善内地金融业的营商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王勇：此次中国放宽对金融服务业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可能会大大提高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投

资和布局的积极性。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创新能力，外资金融机构都有很多值得中资金融机构学习的地方，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形成双向开放的市场氛围，这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仪：我国当前这一开放政策推出的时机比较成熟。第一，中央对金融开放准备已久。《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重要任务，要求“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第二，国内金融业已有长足发展，部分领域世界领先。国内银行机构无论是资产总额还是利润水平，在全球均名列前茅。同时，金融科技在中国蓬勃发展，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融资总额跃居全球榜首。信息技术和金融的深层次融合改变着现有金融的边界，重塑金融服务的运作方式。金融业开放将给中国金融科技提供新契机。第三，无论是上海、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均将金融开放作为改革创新重点。《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金改40条”）即为缩影，其明确提出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自贸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不超过49%。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自贸区也有类似‘金融开放窗口’等提法的改革目标。金融风险的高低，主要不在于开放程度，很大程度上在于监管是否有效。就短期而言，应明确资本流动审慎管理的监管目标，建立资本流动风险评估体系，加强金融体系脆弱性管理，设置资本流动逆周期缓冲，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导致的金融体系风险累计。从中长期来看，还要加强审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配合，在对冲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上，增加本币汇率弹性，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放宽金融服务业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无疑是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更多的外资参与将有助于推动内地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并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欠

缺的不是市场主体及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更加规范和成熟的市场。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规范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促进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更好地结合。尽管开放是大的方向,还有空间,但在目前不是最紧要的。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提速,资本账户越来越开放使得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成本越来越低、渠道越来越顺畅。未来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交易所方面。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本将逐步增加对A股的配置,尤其是在沪港通、深港通已打下良好基础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面向国际投资者的步伐也会加快。二是在债券市场方面。SDR债券市场的开启,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促进和稳固的作用。三是场外市场,如天使投资、创业投资、PE投资等投融资方式,这些海外基金进入中国风险投资领域,预计未来将进一步放宽。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未来资本市场的开放,将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本市场融资主体的开放,即证券融资体系的对外开放,包括证券融资对国外企业开放(包括在国外注册的中资机构),以及证券融资对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合资、合作、独资等)开放。二是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开放,即证券投资体系的开放,主要是指国外资金直接或者间接地投资中国证券市场。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总编审:任朝霞 满岩

责任编辑:任朝霞 赵军利

联系人:陈新孙 杨宇 电话:(010)68558515 68140683 13910382901 Fax:(010)68558341

Email: cxinsun@cei.gov.cn yangy@mx.cei.gov.cn
